佛山士绅与《（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

单　磊　陈海丽
（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10.65285/RWYSHKX.V2I7.004

摘　要：清代三次纂修的《佛山忠义乡志》均由士绅主持纂修。民国时期，佛山部分开明士绅在清末新政、地方自治、实业兴办和新式教育中实现了知识结构的更新，成为《（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编纂的主体力量，赋予该志以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士绅的价值观念仍保留传统道德遗存，使志书在宪政理念与纲常名教、改革诉求与革命浪潮之间呈现新旧交织的复杂面貌。士绅认知的近代化程度，直接决定了方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取径与限度。
关键词：佛山；士绅；《（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The Foshan Gent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Foshan Zhongyi Township Gazette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ei Shan, Haili Chen
College of Marxism, Fos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ll three editions of Foshan Zhongyi Township Gazetteer compiled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presided over by local gent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ome enlightened gentry in Foshan renewed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self-governan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 education. They became the main force for compiling Foshan Zhongyi Township Gazette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endowed the gazetteer with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 times. Nevertheless, the gentry still retained remnants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in their values, which makes the gazetteer show a complex interwoven state of old and new ideas between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and Confucian ethical codes, reform demands and revolutionary tides.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gentry's cognition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approach and boundary of the gazetteer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words: Foshan; gentry; Foshan Zhongyi Township Gazette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前言：

佛山镇自古以来就有编纂地方文献的优良传统，历代方志大多由乡人自发编纂。其中，从清代至民国共纂修四部《佛山忠义乡志》，分别是康熙年间李侍问主纂本、乾隆年间陈炎宗主纂本、道光年间吴荣光主纂本和民国时冼宝幹主纂本。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编纂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之际，反映了时代特点和佛山地方特色。有研究者称此志为“民国间乡镇志中名声最著者”[1]。佛山士绅对此付出巨大心血，学界对此关注不多。本文试分析佛山士绅时代认知的转变及其对该志编纂的影响。

一、清末民初佛山士绅的时代认知

士绅参与编修志书是我国方志编纂的突出特点[2]。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中，士绅阶层介于官、民之间，兼具双重属性，在地方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清初以来佛山镇志的编修历史，志书的编纂与士绅群体密切相关。四部《佛山忠义乡志》修纂的主持者均为地方精英，多有科举功名，往往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广涉政、商、学三界，在佛山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代言人，佛山士绅凭借其影响力，前后四次自下而上地发起方志纂修活动，对传承佛山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前三部镇志不同的是，《（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面临着清末民初社会急剧变动的形势，参与方志修纂的士绅的认知也发生了较大转变。清末新政的实施和科举制的废除，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官僚政治精英的入仕道路近乎断绝。传统政治和知识体系的逐步瓦解对士绅阶层的影响更为直接，绅士群体的地位失去了制度保障，政治特权和文化解释权也随之弱化[3]。然而，佛山士绅并未在短期内走向消亡，相反，随着西方思想文化逐渐传入，一部分接受新知识的传统士绅明显感知到时代的变迁，开始顺应革新思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积极实现自身的转型。

在政治方面，部分思想开明的士绅保持着参与地方政治的热情，不仅认同改革思想，还参与新政立宪的实施过程。戴鸿慈作为锐意革新的立宪派官僚，在清末新政与立宪的筹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戴鸿慈作为清廷派出的“五大臣”之一，出使欧美，考察民主政体，回国后参与提议清廷改定全国官制，实行君主立宪[4]。地方自治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1909 年广东省设立咨议局，佛山镇积极响应，相继建设起自治会、学堂、警察局、工艺局、红十字会。戴鸿慈之弟戴鸿惠曾担任佛山镇议事会会长，佛山大魁堂值理冯熙猷曾任佛山自治会会长。宪政筹备和

佛山地方基层自治的开展，客观上为士绅提供了理解宪政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参与地方事务的地方士绅对民主制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在经济领域，随着奖励工商政策的实行和重商观念的兴起，一大批佛山士绅逐渐加入到振兴商务、兴办实业的活动中。光绪三十三年，佛山镇遵商部令设立商务分会，初任总理为王寿慈，其后是戴鸿慈之弟戴鸿宪。商会承担着联络地方商情、研究商学的职能，为佛山士绅提供了交流活动场所，也使得绅商结合的特征日益鲜明。佛山绅商除参与半官方性质的商会外，还把持着一些卓有成效的近代企业和铁路公司。随着近代市场的逐渐开放，佛山一带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外出经商者日益增多。简照南与其兄弟简玉阶在香港创办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并在佛山开设多个工厂，使用机器进行工业制造，带动了佛山镇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部分士绅在开办企业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往来，还使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近代的文化教育改革成为了士绅接受现代思想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八年（1902）《奏定学务章程》颁布，从京师大学堂或各国学堂毕业者，在通过学部复试及格后，可奖给进士。佛山作为繁盛市镇，“学制得与府县同。聪俊子弟，文理明通，涉知西学者所在多有”[5]。陈煜岸接受新式教育，于光绪三十年获授进士，此后任职于新式学堂。除接受地方新式教育之外，也有许多士绅选择留学海外，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技术。佛山绅董陈振先早年求学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归国后被清政府赐予农科进士出身，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牛乳、羊毛的品质，取得了巨大成果。卢公辅曾赴日本游学，归国后被宣统政府授予格致科进士出身，民国时期曾担任南海县督学局局长。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佛山士绅阶层积极探求救国图强之路，部分士绅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西方文化的熏陶不仅深化了他们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理解，还为他们参与社会变革和地方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士绅的角色、功能与国家政治权力及其自身拥有的文化、经济资本有关。佛山士绅参与推行新政、地方自治、铁路建设、企业开设和兴办学堂等活动表明，部分远见卓识的士绅开始从传统阵营中逐渐分离出来。总体来看，政治参与、经济积累和文化转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边界，商贸发展和政治参与使得士绅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更为频繁，有机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外来思想。新式教育的发展又为近代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人才。

二、佛山士绅认知转变与镇志重修

近代佛山士绅时代认知的转变对《（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佛山地方社会陷于动荡，志书的修纂也随之中断。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宣布实施教育改革，诏谕天下修纂志书，在地方弘扬乡土教育，掀起了编纂乡土志的潮流。作为用于实施乡土教育的教材，乡土志和传统的地方志存在一定的区别。首先，乡土志的例目门类需要遵循《乡土志例目》的规范性指导，主要分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十五个部分。其次，在内容上，乡土志的文本篇幅大多较小，且更加浅显易懂，如《齐东县乡土志》所称：“泰西各国皆以乡土志为入学之先务，乡土志者，有旧志之详核，无旧志之繁重。”[6]此外，乡土志与地方志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途径，前者具备明显的教材性质。无论是例目门类、文本内容或是用途，地方志和乡土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然而也有许多编纂者因为体例内容的部分相似而将乡土志视为地方志的一种。这就为提出编纂志书提供了合适的契机。

在新政时期，戴鸿慈对家乡事务颇为关心，借助乡土志的编纂背景，联合地方士绅积极推进修志事宜，为《（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工作赋予了一层新政的意义。由于戴鸿慈逝世，重修之议未能得到落实。民国八年（1919），广东省政府设立通志局，组织续修省志。时任南海县县长汪宗准重视佛山的名镇地位，认为镇志失修已久亟需重修，于是将重修之事提上议程，聘戴鸿慈之弟戴鸿惠为总理修志，并推举冼宝幹担任总纂。在道光本旧志成书九十余年后，民国新志的纂修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民国佛山镇志的编纂受到了佛山地方士绅的鼎力支持。许多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佛山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志的修纂工作。冼宝幹能够被公推为方志的总纂，既根源于他深厚的家学和卓越的才能，又与他赞同并积极推进宪政有关。他肯定洋务运动的成就，拥护立宪政治。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佛山士绅的政治理念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势必对镇志纂修产生影响。

还要指出的是，佛山士绅的认知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并非所有传统士绅都能够真正理解并认同清末民初的变革思潮。寓居佛山的南海县举人霍伟南虽然主动禀请实行自治，但错误地理解了宪政的意涵，用传统宗族观念来理解资产阶级的宪政体制，认为“家族自治”也属于地方自治的一部分。吴尚廉为道光本主修吴荣光之后，精通传统律学，也涉猎国际法，他虽然承认清末民初的“法典革新”，但民国改元后却选择拂衣南归，杜门不出[7]。谈道隆为晚清进士，在清政府被推翻后，流寓香港，以诗歌寄托旧朝之思[8]。以上士绅都曾参与倡修镇志，但他们的时代认知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对新旧时代转型的迷茫。此外，倡修佛山镇志的绅董中，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倡修镇志未必出于对家乡的情感，或许更多地夹杂着仕途的考量，当然也不乏真正支持变革者。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并非断绝传统士绅的发展，佛山士绅还可以依赖他们在地方社会长久以来的势力，影响地方各项事务的发展。

士绅对时代的认知出现不同，士绅群体内部已然分化，在守旧、迷茫动摇的士绅之外，还有主动革新自我思想、

更新知识结构的新型士绅，使士绅阶层的知识观念呈现出新旧兼学的特征。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近代化变革冲击了传统政治和文化，也使传统士绅在地方基层社会的地位产生动摇。佛山士绅凭借其影响力，广泛参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事务，受到西方文化的辐射影响。部分开明士绅对时代变迁认知更加清晰，积极更新自身观念，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的近代化转型。

三、佛山士绅的认知对镇志内容的影响

清末民初社会的转型，使佛山士绅在政治理念、价值心态、思想观念上发生不同程度的转变。部分开明士绅在政治参与、贸易交流和新式教育的过程中，主动或顺势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熏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实现了知识结构的更新。他们作为方志编纂的主体，进一步影响了佛山地方志的编纂。

近代文化教育的传播和接受并非一蹴而就，士绅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对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遗存，对该志的撰修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首先，其认为清末新政与民国政体前后因循，似乎忽视了政体的更替。其次，其对农民战争、革命浪潮持犹疑态度，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地方作乱。此外，维护纲常名教，颂扬节孝贞烈，“节孝坊”一目记载了许多“青年守节、白首完贞”的妇女形象。还记录了怪妄迷信的门目内容，在“灵异”“轶闻”目中收载鬼神物异之事。

不过也应肯定其质量和价值上的可贵之处。其发展宪政、支持改革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具有反抗西方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思想，也已关注到女性群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且虽沿袭前志记载灵异，但仍以人事为主。这些特征表明，《（民国）佛山忠义乡志》既是士绅认知近代化的产物，也是其传统价值观念的遗存，新旧交织构成了这部志书的复杂面貌。

结语：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佛山士绅群体时代认知变化的直接产物。部分开明士绅在政治参与、实业兴办和新式教育中实现了知识结构的更新，成为方志编纂的主体力量，赋予志书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进步倾向。然而，士绅群体的认知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其价值观念中仍保留着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遗存，使志书在宪政理念与纲常名教、改革诉求与革命浪潮之间呈现出新旧交织的复杂面貌。

这一个案表明，近代方志的转型并非单纯的体例更新或内容扩充，而是深深植根于编纂主体认知结构的近代化程度。士绅阶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取径与限度，直接决定了方志变革的深度与广度。佛山士绅的时代认知与《（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士绅的认知转型推动了志书的近代化变革，而志书的编纂实践又反过来固化和展现了士绅群体的思想图景。

参考文献：

[1] 许卫平 . 中国近代方志学 [M].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109.

[2] 刘翔宇 . 民国士绅变迁与县志编修探析——兼谈志书官修 [J]. 中国地方志 ,2023(1).

[3] 贺跃夫 .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75−76.

[4] 冼宝幹 . 建置志 [A].（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M]. 岳麓书社 ,2017:110.

[5] 冼宝幹 . 教育志一 [A].（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M]. 岳麓书社 ,2017:152.

[6] 袁馥村 , 等 . 齐东县乡土志序 [A]. 齐东县乡土志 [M]. 清宣统二年刻本 .

[7] 冼宝幹 . 人物志六 [A].（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M]. 岳麓书社 ,2017:667−668.

[8] 易仁 . 正声吟社之诗钟 [A]. 李俊权 , 等主编 . 粤海挥录 [M]. 中华书局 ,2005:46−47.

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类项目“史学视野中的《（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研究”（2021WTSCX082）。

作者简介：单磊，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海丽，佛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